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 and 选择^{*}

杨 凡 翟振武

【内容摘要】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关键词】人口转变; 中国道路; 计划生育

【作者简介】杨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Expl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Yang Fan Zhai Zhenwu

Abstract: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aralleled each other from 1949 to 1978. Mortality rate decreased rapidly during the early 1950s as a result of the public health campaign, which initiated the proces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Countering the problem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1950s, China put forward the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realizing planned childbearing”,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brewing.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reinforced in the 1960s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lly, China launche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y vigorously implementing population control and family planning in the 1970s in the mids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size of population exerted great press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hinese Model,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uthors: Yang Fan is PhD Student,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yangfand@163.com; Zhai Zhenwu is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 本文受到“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建国以来的 60 多年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人口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成功地完成了从“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人口转变过程。在人口的变化过程和治理人口问题的历史实践中,中国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 30 年时间,是中国人口转变道路探索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并非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其中不乏疑惑、争论、甚至反复。在始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饱尝放任人口无序增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后,人们终于明白,中国的人口转变不能坐等社会经济发展而自然实现,最终做出了主动干预人口发展过程、促使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正确选择。

1 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政府对人民身体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大规模群众卫生运动的开展使许多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传染病得到控制,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国自 1840 年开始的长期战争局面得以结束,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欺压的屈辱历史得以终结,中国进入了一个独立、和平、稳定的新时代。1949~1952 年,中国通过回收主权、抗美援朝等运动稳固了新生政权,通过剿匪清恶霸、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稳定了社会环境,通过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取缔卖淫、吸毒、赌博等活动改变了社会道德风尚。1953~1956 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和平过渡的方式,三大改造完成后,全国上下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平稳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建国初期这些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有利于民众休养生息,为人口从战乱中恢复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

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残破和落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旧经济进行了改造,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通过土地改革、调整私营工商业、扶植发展个体手工业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通过强化市场管理、统一财政经济实现了经济的良性运行。这些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49~1952 年,社会总产值增长了 82.2%,国民收入增长了 64.5%,农村年均人均收入增加了 30.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一五”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同时进行。“三大改造”使旧的生产关系得到彻底改变,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使中国的工业基础初步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提高了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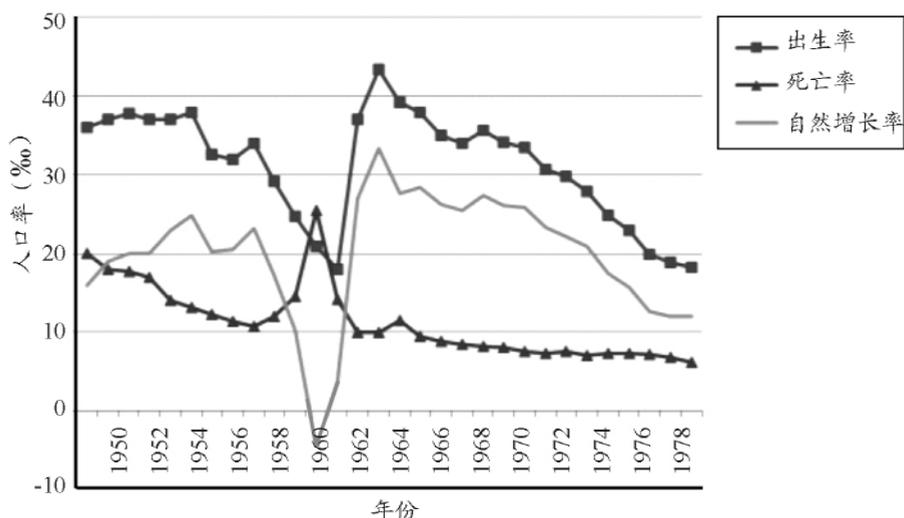
在社会经济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一场人口领域的攻坚战也正在展开。旧中国遗留的传染病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直接威胁到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政府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到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上,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将卫生活动和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血吸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曾在我国南方地区十分流行。建国初期,卫生部门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重灾区去,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小组,并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号召,消灭血吸虫病列入了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数以亿计的群众投入到灭螺的活动之中。天花也是在旧中国十分流行的、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1950 年底开始,由于推行全民种痘,我国天花的病例数从 1951 年的 61546 人下降到了 1960 年的 77 人,最后向世界证明中国彻底消灭了天花(朱汉国、耿向东 2010)。此外,鼠疫、疟疾、黑热病、结核病、丝虫病等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均迅速下降。政府如此重视疾病的防治工作,并动员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这在整个人类

的发展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日益提高的经济水平和不断发展的医疗卫生事业对中国的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死亡率迅速大幅下降,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从 1950 年开始,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在 37‰左右的高位维持了 5 年,此后缓慢下降至 1958 年 30‰左右的水平;与此相对的是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从 1949 年的 20‰左右降至 1958 年的 12‰左右;两者的差异一度造成了自然增长率的迅速升高,从 1949 年的 16‰左右的水平攀升到 50 年代中期 25‰左右的水平(图 1)。人口规模在这个时期也呈现出一种加速增长的态势,从 1949 年的 54167 万人迅速增长至 1958 年的 65994 万人,短短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1 亿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

图 1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49~1978

Figure 1 Birth, Death and Natural Increase Rates, China, 1949-19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中国的死亡率下降过程无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超快速”的。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是中国人口转变进程的起点,也拉开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序幕。中国的死亡率下降过程与其它国家有着相类似的地方,也有着体现中国时代发展背景与国情特征的、区别于其它国家人口转变过程的不同特点。首先,与所有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相同,中国死亡率的下降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其次,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而与战后经历人口转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同,中国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战后的技术进步 and 健康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普及,也是民族独立运动胜利创造的和平稳定环境所带来的产物;最后,最为重要的是,与其它任何国家不同,中国的死亡率下降与政府对人民身体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 and 所采取的特殊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对人民身体健康问题的重视,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只有在这样的国体下,社会经济进步所带来的成果才能迅速、平等地惠及全体人民。集中资源、建立严密的体系、广泛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最大化地利用原有基础,这些方法保证了建国初期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斗争的胜利,也是导致死亡率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些方法是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战争 and 建设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经过长期培养形成的默契,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创举。在实现中国死亡率迅速下降的过程中,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一些原始元素 and 关键特质都已有所显现,为未来在更为广阔的舞台施展奠定了基础。

2 对中国人口快速增长问题的认识和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孕育

20 世纪 50 年代,死亡率的下降引发了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人口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从政府领导人到普通百姓,无一不对人口快速增长的现象充满了惊讶和思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兴奋、欣喜、疑虑、迷茫和担忧互相交织。而 20 世纪 50 年代那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大讨论正是这种对人口问题高度关注和对人口快速增长现象复杂矛盾心理的集中体现。最终,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人口过快增长的严峻现实使人们做出了选择,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

1953 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调查结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调查结果显示: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全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 6.02 亿(路遇、翟振武,2009)。这远远超过了许多人之前所相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为 4.5 亿的估计值。而且,中国人口仍以平均每年 1200 万左右的速度不断增加。“人口过多给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邓季惺,1957),成为中国人口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出来,引起了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关注。

面对“人口多、增长快”的现象,人们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兴奋和欣喜,因为上千年的发展历史都表明,人口快速增长自古都是盛世的表现,中国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产品足以养活 6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明证。其中也有疑惑和迷茫,因为人口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如此快速的增长势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未曾对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有过详细描述,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发展终点在何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人口增长趋势。其中更有担心和忧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逐渐感觉到庞大的人口规模给粮食、就业、上学、交通等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种复杂和矛盾的社会情绪不断累积,最终以一场学术讨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围绕着中国是否人口过多、是否要进行人口控制等问题,专家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反对进行人口控制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过剩人口问题,工农业的生产增长能够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白建华,1954)。赞成人口控制的学者认为人口过多、增长过快的现象对于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人口发展要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全慰天,1957)。从表面上看,这是反对和赞成人口控制双方学术观点的交锋,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人口理论与人口现实之间矛盾的思索。一方面,前苏联的人口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过剩人口问题,国家要创造条件实现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们又切实感受到了过多的人口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的巨大压力。通过这场辩论,解决这种矛盾的思路也逐渐清晰,那就是改变盲目照搬苏联人口理论的做法,立足于中国实际来认识中国的人口发展规律、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人们不再回避讨论人口过多给整个国家带来消极影响的问题,逐渐形成人口也要有计划按比例增长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国化的意识也逐渐觉醒。

现实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进一步促使政府必须在人口问题上表明态度,在人口政策方面也不能再继续放任自流。其实,当学术讨论还在进行之中、政府的人口政策还处于空白之时,中国人民早已用自己的行动对中国人口是否要控制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953 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去。过多、过密的生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许多人已经开始采取避孕节育的措施。但是由于缺乏知识和手段,他们的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所以迫切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人口普查的结果也引起了党和政府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他们纷纷表达了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赞成态度。1953 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们对赞成节制生育的态度,并积极地推动

节制生育工作的开展。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主张通过人类的自我控制和管理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彭珮云,1997)。作用力来自上下两方面,但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两者形成的合力很快发挥了作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明确了节制生育的重要意义。此后,计划生育活动在我国初步实施。卫生部多次修改和发布关于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问题的办法,为全国开展节育活动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全国各地通过开展避孕节育的宣传、技术指导、药具生产和供应等工作,使计划生育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50年代后期生育率的下降说明初步的节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这个时期,如何认识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和快速增长的问题,引起了包括党和政府、学术界以及普通群众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严肃思索。思索的结果是,在严峻的人口现实面前,他们不谋而合地给出了一致的答案,那就是赞成控制人口、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其中,对人口理论和规律的探索所取得的进展最为明显:摆脱了苏联人口理论的束缚,从中国国情出发,正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人口发展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对人口政策的探索略显逊色,只是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项政策目标并且顺应民意满足他们的避孕节育需求,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形成系统的政策。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进步都已充分说明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已经开始孕育。

3 在困难和反复中找到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

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并在曲折中前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到文革之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先是由于思想的动摇导致了工作的停滞,尔后是人口近乎失控性的继续增长。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停滞、困难和反复中,人们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逐步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以后,很多人都相信只要能够广泛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就能够创造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建设神话。此时,全民上下表现出一种盲目追求速度的冒进倾向,最后演变为1958~1960年期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了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建设指标,这些指标是无论怎样发动群众也无法实现的,一时间浮夸和瞎指挥的风气盛行,导致人们更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分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时出现的“全民大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运动的集中体现。“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使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农业浪费损失严重,生态资源遭到破坏。在农村,违背科学规律的深耕密植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能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搞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农业生产大幅下降。这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使农业生产更加艰难。1957~1960年,农业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了4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3)。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吃饭、穿衣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受到威胁。1957~196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了19.4%,人均棉布消费量下降了58.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3)。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的严重短缺,大批人营养不足,甚至死亡。在这个时期,出生率从1958年的29‰降低到1961年的18‰,死亡率则从1958年的12‰迅速升高到1960年的25‰;在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更是骤然下降,从1957年23.23‰下降到1959年的10.19‰,并在1960年达到-4.57‰,这是中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唯一的一次负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

“大跃进”时期,人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被严重夸大,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但是,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在这个时期充分暴露出来,结果是国民经济遭到破坏,人口也蒙受严重的损失。现实彻底击碎了人们对社会

主义条件下可以实现人口永远持续高速增长幻想,使他们认识到依靠人口规模优势和群众动员所产生的力量是有限的,终究无法逾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所以,要缓解人口规模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发展生产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快人口转变。也正是天灾人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主动干预人口发展过程、进行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5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比例趋于正常,农业产出大幅增加,财政收支平衡,市场供需稳定,人民生活改善。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度中断的人口增长进程再次启动。许多在困难时期没有结婚的适龄人口登记结婚,许多在困难时期未生育的妇女进行了补偿性的生育,一时间结婚和生育的人数大幅上升。1962年,初婚妇女比1959年增加了70%,当年出生孩子2464万,几乎等于1960、1961年出生孩子的总和;1963年人口出生率增加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43‰,出生人口数量达到2900多万,总和生育率也高达7.5(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此后的整个60年代,虽然人口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只是恢复到与50年代相似的水平上,一直维持在35‰左右;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使死亡率继续下降,1962年死亡率为10.02‰,已经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并继续延递减的轨迹发展,到1969年已经下降到8.03‰;1962~1969年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5‰以上,1963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33.33‰(图1)。这8年的年平均增长人口达到了2000多万,1963年净增人口达到了227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

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是50年代人口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暂时的天灾人祸将这一发展趋势划分为两个发展时期。两个时期人口增长现象的形成原因是相同的,主要是由于生育率一直维持在高位,而死亡率一直处于稳定的下降过程而形成的。死亡率的下降延续了50年代以来的轨迹,是由于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生育率的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影响,此时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是一种普遍性的大包大揽的福利制度,它使人们更愿意多生。虽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表现出了相似性,但是此时人们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认识却已经更加深刻了。50年代,人们在是否要进行人口控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大跃进”时期甚至对人口控制还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但是在60年代经历了天灾人祸引发的人地矛盾空前尖锐、人口重新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后,人们对人口控制的态度已经是非常坚决。在困难和反复中,人们得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第一,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既不能效法欧美,坐等社会经济发展来实现人口转变,也不能师从苏联,任由人口自由发展,因为我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中国已经没有等待的时间和放任的空间。第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也不可能单方面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无论怎样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依然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始至终都无法超越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走主动控制人口的道路,这才是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正确发展方向。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央第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专门文件,它将计划生育同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重申了党和政府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和重视,使全国的干部和群众统一了认识。《指示》发布后,我国开展了以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工作。

通过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政策框架也日益明朗,表现出明显的特点。第一

是国家性,政策目标是保证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生育不再只是家庭私事,国家必须进行干预。生育是典型的家庭功能,国家政策延伸至家庭事务,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尝试。第二是计划性,政策工具是计划,人口发展目标被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之中。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三年调整时期、“三五”、“四五”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各地结合本地的实际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和规划。具体的生育政策方面出现过例如“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晚、稀、少”的提法,但都尺度宽松,不是硬性要求,而是提倡和鼓励的方向。第三是群众性,政策措施是服务群众、依靠群众。这个时期开展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宣传教育和提供技术服务。通过宣传教育改变群众的传统观念,将群众对计划生育的认识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繁荣昌盛的层面上来,自觉限制生育;通过提供技术服务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满足广大群众的节育需要。这些政策和措施切入点准确,不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还有效地将中国人的爱国传统和担当意识转化为对计划生育活动的支持。

4 对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做出选择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经济发展起伏波动,极其脆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的正常工作都受到严重的干扰。计划生育工作再次停滞下来,办事机构被裁撤,工作人员被削减下放。人口发展也重新回到自由放任的无序状态。1966~1972年间,每年的出生人数都在2500万以上,自然增长人数保持在2000万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不断增加的人口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口与经济的矛盾再次突显出来。政府通过“上山下乡”、“支边”等方法来转移人口压力,但是代价巨大而且治标不治本。人口问题再次牵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心,多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庞大的人口规模与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矛盾一直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成败而时缓时紧。人口问题就像是一座活火山,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每次不定期的爆发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要去除这种潜在的危机,不仅要时刻不松懈,而且要从源头入手,主动控制人口。

如何解决庞大的人口规模与不堪重负的经济发展的矛盾成了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巨大难题。要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人口经历着随朝代兴衰而增减的轮回,人口与经济矛盾的矛盾时有显现。封建帝王们采用的方法不外乎一个“拓”字,或开垦荒地,或拓展疆域。此时的中国能开垦的荒地已经很少,而一个刚把侵略者赶出国门、才从战争创伤中恢复、信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更不可能去靠侵略缓解人口压力。放眼全球,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曾被人口过多的难题而困扰,甚至根据人口发展的过程总结出人口转变的理论。但是时过境迁,中国此时面临的环境已不同于欧洲,由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增长的浪潮比当时的欧洲快的多也猛的多,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依靠开辟新大陆来输出口。此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遭遇了与中国相同的人口问题,它们将人口控制的重点放在生育率上,因为这是一种直接、有效、社会接受度高的方式。但是这些国家所采取生育政策只是政府承诺为自愿减少生育的人群提供帮助,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不仅无法满足所有自愿减少生育者的需求,更不用说改变那些不愿减少生育者的行为了,控制人口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也仅仅是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到底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降低生育水平,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复制,中国必须选择一条符合时代背景和自身国情的人口转变道路。

数十年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给中国提供了经验和线索。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和中国人口理论的发展成果都表明,中国必须走一条主动控制人口、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道路,而且要持之以

恒 时刻不能放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所积累的经验、群众卫生运动和 60 年代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功让中国寻找到了可以有效降低生育率的模式。最终,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人口转变道路:它不是等待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生育率自发性地下降,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还比较低的背景下,积极主动地去干预人口发展的进程;它通过国家制定目标对人口发展速度进行控制,通过建立严密的体系来贯彻政策,通过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担当意识,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自觉限制生育,达到政策要求。必须指出的是,确立这样一种人口转变道路,完全是无奈和被迫的选择,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中国不得不选择这样的人口转变道路。党和政府不是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将为此做出的牺牲和今后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但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这是一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选择。

1971 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第一次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普遍推行计划生育。1973 年,中央和地方都建立起计划生育机构。同年 12 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受此影响,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迅速下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发生转变。从 1974~1978 年,人口的出生率从 24.82‰持续下降到 18.25‰,自然增长率也相应从 17.48‰下降到 12.0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 4.2 下降到 2.7,每年的净增人口也一改以往在高位波动的趋势,历史性地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1974 年的 1574 万迅速下降到 1978 年 1147 万(路遇、翟振武,2009)。人口经历如此快速的生育下降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中国的生育水平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接近,中国的再生产类型已经逐渐向现代类型转变。此时的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口转变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自信地迈开了步伐。

5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殊性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这是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也是探索中国特色人口道路的关键时期。在经历和解决了数次人口危机之后,人们深化了对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认识,明确和坚定了主动控制人口的态度,中国化意识日益显现,人口政策体系也逐渐形成。最终,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口转变道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表现出“超前性、干预性、压缩性”等种种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源自于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时代的进步使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技术日益进步、健康知识广为传播,所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比 18、19 世纪经历人口转变过程的欧美发达国家更为迅速。也正是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人口转变过程中通过殖民统治和开发新大陆来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而必须采取主动进行人口控制的方式加以解决。

其次,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保证了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性,使政府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问题列为头等大事,即使是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正是促成死亡率迅速下降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对集体资源的支配能力和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的约束能力使人口政策的执行力得以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建立严密的网络体系和发动并依靠群众力量的做法把在长期以来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灵活运用在人口控制当中,使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胜利在人口领域得以延续。也只有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领导下,政府才愿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敢于冒着执政地位可能发生动摇的风险仍要坚决进行生育控制,这是令其它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所望而止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担当意识和重视集体利益的文化传统,都对死亡率和生育率的超快速下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

- 1 白建华. 六万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 人民日报, 1954-01-01
Bai Jianhua. 600 Million People: The Great Force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eople's Daily. 1954-01-01.
- 2 邓季惺. 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利益. 人民日报, 1957-03-19
Deng Jixing. Family Planning Is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Socialism. People's Daily. 1957-03-19.
- 3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 46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2007. China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History.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ress: 46.
- 4 路遇, 翟振武. 新中国人口六十年.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9: 53, 70
Lu Yu and Zhai Zhenwu. 2009. Sixty Years of New China Population.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ress: 53, 70.
- 5 彭珮云.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7: 131
Peng Peiyun. 1997. Family Planning Pandect of China.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ress: 131.
- 6 全慰天.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 大公报, 1957-03-22
Quan Weitian. Economic Laws of Socialism and Population Issues of China. Ta Kung Pao. 1957-03-22.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83.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13, 375, 37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1983. China Statistical Year Book 1983.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3, 375, 377.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84.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20, 29, 81, 83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1983. China Statistical Year Book 1983.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 29, 81, 83.
- 9 朱汉国, 耿向东. 20 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 1949-2000).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09
Zhu Hanguo and Gen Xiangdong. 2010.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Social Life Volume 1949-200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09.

(责任编辑: 沈 铭 收稿时间: 2011-12)